

李改香:为躲避日军藏在坟墓里三天两夜

口述:李改香 记录: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 徐美龄 摄影: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 吴小兵 徐美龄

人物档案

李改香

性别:女

抗战经历:1938年任山西省阳城县次营镇北次营村儿童团长;1942任山西省阳城县妇救会干部;1945年5月调往太岳区经济总局工作;1947年3月在中原野战军4纵队留守处、13旅直属队、二野四兵团13军直属队担任区队长、副指导员、指导员等职。2015年7月26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3医院逝世,享年89岁。



扫一扫,听她讲过去的故事

用红缨枪把老师押到村公所

抗日战争时期,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建立的少年儿童组织被称为儿童团。凡是愿意为党为人民贡献自己力量的少年儿童都可以加入儿童团,担负站岗、放哨、送信等任务。儿童团一般以村为单位建立,受党支部或共青团、妇联的领导。

我们家是贫农,我有5个哥哥,2个姐姐,家里靠租别人的田种地过生活。

父母都还算开明,因为我是最小的,所以我承担的家庭重担相对于哥哥姐姐要少,家人们都很支持我干的每一件事情。十多岁我就开始在村里跟小伙伴们当小兵站岗。

有一次,我扛着红缨枪在村口值班站岗,来了一个打扮很书生模样的人,我拿着红缨枪拦住他,不准他进村。他跟我说我们是村里来的新老师。我让他背着手用红缨枪指着,带到了村公所。后来在村公所,他拿出了政府的委任状,证实了他的身份,确实是我们村新来的老师。于是我向他鞠了个躬,又跑回去站岗了。也就是因为这样,他对我印象非常深刻。后来在他的推荐下,1938年,12岁的我当了儿童团团长。

1942年,区里面来我们那选干部。参加竞选时,一共有7个候选人,每个人手里拿一个碗,每个村民手里捏一颗豆子,投谁就把豆子放到谁的碗里。我被老百姓选上,调到区里担任妇救会干部。

为躲日军屠杀藏进死人坟墓

1943年9月底,日军华北方面军第1军第37、第62、第69师团各一部及伪军一部共2万余人,分三个梯队,以“铁滚式”新战法,由北向南“滚进”,再

自南向北对太岳区反复清剿,妄图摧毁抗日根据地,建立“山岳剿共实验区”。八路军太岳军区决心以4个军分区主力部队,以连为单位分散坚持内线游击战,基干团主力转入外线作战,采取内外线紧密配合的战法,粉碎日军扫荡。

1943年,日本人大扫荡,阳城县老百姓人人自危。我当时负责掩护老百姓,给组织传递消息,还负责保护粮食。

有一次遇到日本人把我



2011年春,李改香和丈夫在东湖干休所家中的小院合影。

们的办事处包围了,我们联络点的同志临时转移。我当时在另一个村子里送消息,拿到回复的消息往回走时发现了异常。当时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我们所在的村子,有个老百姓给了我一个暗号,原本应该告诉我的意思是“日本人在,不能回去”,后来才知道他将暗号搞反了,我拿着消息一路往回走。走进村子才发现日本人已经到了那,因为我是共产党员不能藏在群众家里,怕连累老乡。我跑到了树林子里,但是日本人的搜索很密集,我无处可躲。乡亲们见我一个女孩,怪可怜的,如果被日本人抓到肯定必死无疑。到晚上,村里的几个壮汉挖开了一个死人坟墓,并掘了一个大约2米深的洞,将旁边的泥土稍微拍紧后,我就躲了进去,他们在我头顶盖了块木板,上面覆上土。就这样没吃没喝,度过了三天两夜。日本人走后,老乡才把我拖出来,当

时的我已经奄奄一息晕倒在里面。所幸我命大,最后还是活了过来。

我宁愿死也不能被日本兵抓住。他们抓住女人都是先奸后杀,杀人的时候还用刺刀把女人的胸部和子宫都刺破,掏出来。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,况且当时我身上还带着消息,得回去复命。

日本人的残忍无法形容,我还记得,当时我们区公所的同志们在一座庙里开会,中间还有两个上面下来的干部。汉奸带路,日本人将他们包围了。只听到“咚咚咚”持续不断的枪声。日本人走后,进到庙里一看,所有的同志都死了,无一人能幸免。

吃过简单的“婚宴”,丈夫就扛枪上了战场

1937年冬,中国共产党开辟了太岳区革命根据地,但正式组成的时间则到了1941年9月1日,并归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领导。

1944年,我到县里参加学习班,在学习班时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因为在学习班结业考试中我得了第二名,于是就被调到太岳区经济总局工作了。除了白天的工作外,晚上我和同志们还得去敌人的城墙上写标语。一般我们都是用水和着煤渣当颜料,然后拿烂扫把在墙上写字。

1946年2月的一天,我被阳城县委书记叫到办公室,说介绍一个人给我认识,这个人就是正在山西作战的韩先良同志。随后我骑着马赶到了韩先良所在的部队驻地,在一个老百姓的院子里,终于和他见上面了。他当时武器装备都在身上,我们匆匆聊了几句后就分手了。不久之后我就收到了韩先良的来信,随信还夹有一张他的黑白照片。

两个月之后,韩先良同志捎来口信,让我马上去他所在的部队。于是我向领导

请了7天的假,骑上马出发了。这时候韩先良同志已随部队到达山西绛县。走了三天两夜,绕过敌人的封锁线,我才到达韩先良所在部队的驻地。到达部队后,当时没有看到韩先良,一打听,才知道韩先良正在参加一个作战会议。会议由旅长陈康主持。陈康很关心韩先良,得知他的对象来到了部队,在作战会议结束时,当即宣布为我们俩举行婚礼。这一天是1946年6月20日。中午战士们吃饭时,部队有人买来了些糖果,我们吃着茶浓饭,就算是结婚了。

吃过午饭,韩先良同志就扛枪上了战场。我就在司令部等着他。我俩再见面时,是三天后,我的假期也快结束了。那时候可是不能超假的,必须要按时回单位。战斗结束回来时,他牵着两匹马,我收拾好行李,骑着他牵回来的马,由一名警卫员护送我,赶了两天两夜的路程才回了自己单位。从那时起,我们大半年都没见过面。只有一次,韩先良同志途经阳城,来单位跟我见上一面,我们俩吃了午饭,他又匆匆赶往前线。

渡长江跨五省带着孩子追部队

抗战胜利后,战争并没有结束,李改香丈夫韩先良所在的二野13军39师渡过长江。一路上,他们作为先头部队,经江西、福建、广东、广西等省区,于1950年年初到达云南,并解放了昆明。

作为部队家属,我带着孩子,渡过长江,开始了追赶部队的行程。不过,我们走的却是经过湖南的路线。我从湖北武汉出发,先是坐了八天八夜的船,后改乘闷罐火车到了衡阳。可是,当我和其他家属带着孩子赶到衡阳时,却发现部队并不在那里。

(下转 A04 版)